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九五期 ——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5c)

【读史笔记】	通往文革之路	周家琮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二)	孙怒涛
【历史疑云】	有关林彪叛逃的四大谜题	时念堂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读史笔记】

通往文革之路

• 周家琮 •

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普京在纪念大清洗牺牲者集会上的讲话

人类对天灾的认识，曾经相当的蒙昧。洪水袭来以人牲祭河伯；大旱降临君王惶恐、下诏罪己；瘟疫流行，原始部落认定有魔鬼附体；直到今天，仍有人相信地震、艾滋，是上帝在惩罚人类。而对于社会灾难即“人祸”的由来，或因偏见而蒙蔽，或为利益所左右，欲谋共识，更难于天灾。诚如洞明世事的列宁所云：几何公理如果违反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推翻。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波匈事件，走上街头的当地百姓，争的是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苏联傀儡的波匈领导人，埋怨是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闯了祸；莫斯科怀疑是华盛顿的颠覆阴谋；对秦始皇坑儒推崇有加的毛泽东，则断言是反革命杀得太少。法国大革命过去了二百多年前，其起因今天仍被关注和讨论，且见仁见智聚讼未决。所以讨论文革起因、探究“通往文革之路”，纷争和歧见更不可避免。

关于文革之起因，迄今尚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得以见之于官方文字。唯一权威的说法，

是1981年就历史问题所作决议的表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灾难。此说作为当时的权宜之计，以避免纷争稳定局势，或未尝不可。但时至今日，倘仍以此概括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无论如何再也经不起理论的推敲和历史事实的检验。首先就历史观而言，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汤因比，都不会容忍把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归咎于少数个人的历史解释。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对此早有深刻论述。任何政治事件的发生，都要通过政治人物的行为得以实现，政治领袖不过是政治集团及其思想和制度的LOGO。把政治灾难归咎于政治人物的错误或破坏，无异于同语反复。说文革是领导犯错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和断言戈尔巴乔夫头搞垮了苏联一样，是将个人作用置于客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规律之上，可以奉上一顶“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论的帽子。况“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江青，此后一直未离中枢和领袖。是什么样的政治熏陶和长期教诲，居然令其沦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又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土壤，让她青云直上身居高位，进而作恶多端为所欲为？岂不令人深思！其次就参与文革的群众动机而言，当年从工厂学校到穷乡僻壤，亿万群众狂热投入革命，文斗武斗不顾身家性命，绝大多数皆抱天真而愚昧的追求和信仰，岂可归因于反革命集团的煽动和欺骗？最后就文革的历史事实而言，文革祸乱全国，被迫害者众加害者亦众。庙堂之上，文革后来挨整者，先前几乎皆有整人之过。每逢整肃党内高层，明哲保身、随声附和者固不鲜见，落井下石、为虎作伥者亦大有人在。在整肃同僚的道路上，文革发动者从来都不是孤家寡人。江湖之广，支持参与文革动乱者，更是不计其数。所谓反革命集团固难逃其罪，然众多恶行的实践，无不假手于各级干部和亿万民众。德国人反思二战灾难，并未把所有罪行向纳粹头目身上一推了之，而是同时反省自身和全民族的错误及责任。不能正视文革年代全党全民之过，为了维护虚假说辞和推脱责任，讳言甚至无视我们自身的错误，同类的错误势必再犯。只有深刻的文革历史反省，才能昭示后人教育下一代，才能真正总结文革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皆源于事件主体内部的深刻矛盾。既非外部力量所可左右，更不是少数人的阴谋得以酿成。希特勒上台、日本军国主义兴起、苏联解体、中国文革，莫不如此。文革十年动乱，自有其社会、制度、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的深刻原因。文革前在高校，号召学生走“历史必由之路”。在有中国特色的斯大林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通往文革的历史必由之路。

中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残酷的族内迫害，都离不开蛊惑人心的狂热教义和思想，文革亦不例外。文革主力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点睛之句，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干文化大革命，靠的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古今中外的革命狂热，都以迫害异端彰显其合法性。“继续革命”也需要不断发现作为革命对象的阶级敌人，以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文革前夕已经发出的信号弹。文革自始至终的战略方针，也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纲举目张”。有了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神圣名义，迫害干部群众师出有名。有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红色后代们把文革当成盛大的节日，欢呼终于又获得象父辈一样投身革命、接班做主人的历史机遇，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地犯下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指导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既有承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处，而最根本的，还是来自对世界政治潮流的警觉和应对。文革发动者对“和平演变”的预见，不逊于布热津斯基和尼克松，令人不得不钦佩其政治上的战略远见。“马上得之”的老革命夺取政权后，遇到了统治权力的合法及传承的新问题。毛氏在1967年斥责清华414，说他们主张“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显然透露出其中的焦虑。克里斯马式的权威崇拜，在打江山的第一代逝去后必然风光不再。虽说“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以血缘世袭避免政治动乱，也曾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放眼全球除了几处孑遗残留，毕竟落花流水春去也。民主选举迹近和平演变，江山流血得来岂可拱手让人。只有“继续革命”，才能维持统治合法性并得以延续。其时海峡对面，同样面临世界政治大潮对集权统治合法性的挑战，虽应对和结果与之截然相反，却充分说明文革绝非领袖心血来潮和坏人阴谋，而是应对世界政治潮流之历史必然。

文革思想资源的另一脉，来自“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封建专制思想。以封建专制思想对抗

资本主义的把戏，《共产党宣言》虽早有揭露。文革却公开标榜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反修防修”的大旗下复辟封建专制，上演了现代版焚书坑儒的惨剧。文革发动者深知，多元包容的文化、闪耀人类良知光芒的普世思想，与专制统治冰炭不相容。因此声称发动文革的理由，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还不在于无产阶级手中。从而掀起了文革破四旧、批封建修、与人类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决裂的疯狂浪潮，以实现久加诺夫所说的意识形态垄断。不愧为“好学生”的副统帅深谙此道，声称“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以军队为发源地，以个人崇拜为旗帜，全面推行思想专制。在经济思想领域，为了维系掠夺式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批判尊重价值规律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思想道德领域，为了让人们安贫乐“道”，泯灭向往美好生活、追求人权自由的天性，做一颗为革命献身的螺丝钉，号召学习据说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模范人物，最后演化为“斗私批修”的闹剧。

文革最崇高的思想支柱，是实现世界革命的伟大理想。自宣称苏联变修之后，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担负起拯救世界三分之二苦难人民的神圣责任，参加亲手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赤化全球，成了文革狂热的精神支柱和崇高理想。国外的文革追随者，既有恐怖组织赤军红色旅，又有西方国家的校园骚动，竟一度让文革发动者产生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幻觉。而向柬埔寨等国输出的革命，颇得文革发动者嘉许：“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近代以来，中国效果最显著的一次意识形态输出，也许就是支持指导红色高棉。结局却是青胜于蓝的屠杀、惨绝人寰的灾难。

亿万群众卷入的文革动乱，之所以一触即发愈演愈烈，也是当时诸多社会矛盾的反应。是实行比较务实，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施政方针，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继续革命？历经批判反冒进、开展反右倾，党内尤其是上层为此一直存在路线分歧和斗争。包括文革中期的九届二中全会，高层所暴露的分歧，也部分反映了这一矛盾。大跃进的失败特别是大饥馑的灾难使基层干群滋生不满。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和整人者、既得利益阶层和被边缘化阶层之间的矛盾，结怨积聚已深，后来成为许多单位派别对立的历史根源。搞特权腐败、骄奢霸道的大小“土皇帝”，与民众对立，干群矛盾已相当尖锐。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又有当权者按以往运动套路整人以自保，制造了新的干群矛盾。由此不难理解，文革初期打倒当权派的燎原之火，为何得以迅速蔓延。

文革灾难得以泛滥，离不开专制传统和制度基础。秉承二千年顽固的皇权专制传统，不少党内高层以臣仆自居，有忠无诤，对文革的倒行逆施不敢反对甚至为虎作伥。亿万民众成了“三忠于四无限”的愚民，甘心充当文革炮灰。是文革发动者利用了官民众生的愚忠，而不是他被什么人利用。独立思考对文革持怀疑批判的少数，遭到无情的镇压和屠杀。党内长期形成的家长制，使违背党内多数意志的一项项文革决议、一桩桩重大冤假错案，仍然形式上通过了合法程序。高度集权毫无制约的一元化体制，加上个人对军队的高度控制，使文革意志得以在动乱中推行。文革令人发指的无数暴行，更有赖于长期无法无天的政治运动、“阶级敌人”的人权毫无保证的法治状况，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制度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文革中被推荐为学习重点。其中就坦然宣称：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力。”文革中的确不乏坏人作乱，但首先必须反思，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让坏人得以掌权还可以任意为非作歹。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对文革发生的制度基础，有过深刻的思考和论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希望。”正是历经文革磨难后的深刻反思，邓氏才会发出上述高屋建瓴之论。遗憾的是如此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当时就有人说不要再讲，而后直至今天，更是被束之高阁无人再提。

文革不是发生在一夜之间。文革尘埃甫定，有人说文革是灾难空前。谭震林老闻言大怒，历数苏区肃反延安审干之事，证明党内残酷斗争源远流长，文革绝非空前。文革的思想文化批判，不过是批胡适抓胡风、评红楼批武训传、思想改造拔白旗的延续，更远还可追溯到整肃丁玲王实味。文革的打倒一切，之前就有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的多次预演。文革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是“四清”即已明确的运动重点。文革中达到狂热的个人崇拜，在神州大地更是早已轰轰烈烈。且始作俑者居然皆为文革主要打倒对象，其中某公大难临头之时，还不忘自己对山呼“万岁”的首创权。文革中一度泛滥的血统论，也出自文革前早已存在、打着阶级路线旗号的严重身份歧视。文革中对“阶级敌人”的种种暴行，文革前早已普遍存在并得到鼓励。文革前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灌输和实践，造就了文革中斗黑帮、打黑五类的血腥和疯狂。也使得昔日的同学同事、甚至亲人间文革中相互为敌，为了谁代表革命路线、谁拥护领袖而自相残杀。如果不是井冈山时期就发生过A B团之类的血腥事件；如果不是延安时期就制造了大批“内奸”冤案；如果没有类似胡风集团的奇冤；如果执政后不曾从中央到地方，仍不断揪出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人们怎么会相信：那么多不畏白色恐怖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职业革命家，在文革中统统成了应该打翻在地的黑帮？如果没有文革前对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丑化、清洗，有着悠久尊师传统的国度，文革中怎么会到处发生学生毒打老师的暴行？如果不是文革前刻意渲染仇恨颂扬暴力，又怎么能想象联动的十几岁花季少女，文革中会成为嗜血的法西斯冲锋队？如果不是文革前长期盲目颂扬历代农民造反，文革群众运动怎么会效仿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愚昧暴行？如果不是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无视法律践踏人权，就在首善之区北京，文革中对扫地出门、草菅人命、乱打乱杀的惨剧，怎么会竟然听之任之无人制止过问？

历史的逻辑是无情的，漠视者难免付出惨痛的代价。以为政治迫害并非社会机体系统沉疴，不过是领导人一时犯错，少数坏人作恶，有人不小心倒霉，而自己可以侥幸置身局外甚至幸分一杯羹，历史的悲剧就会不断重复上演。当1957年的周扬和老舍在批判右派时，绝不会想到9年后自己会遭遇更惨烈的暴行；当1958年亿万人民热火朝天投入大跃进时，他们也难以预料不久就将遍地饥荒道有饿殍；当1964年特大型红歌《东方红》在人大大会堂隆重上演时，台上台下兴高采烈的人们，更不会想到二年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将和台上扮演的地主恶霸一样遭到批斗；当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颂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革命行动，灌输“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格言时，又怎能想到当年地主戴的高帽子，很快就要被无情地戴到自己头上；当文革之初红后代们以为接班时机已到，忠心耿耿地要做伟大领袖的红色卫兵，对“黑七类”疯狂施虐时，更想不到他们的英雄老子很快被一批批打倒，自己不久也被投入大牢；而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后又被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蒯大富们，当他们从此义无反顾地要追随伟大领袖，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时，更是做梦也想不到，几年后会作为文革替罪羊沦为阶下囚。历史的悲剧不只眷顾芸芸众生，当1967年的国家元首悲愤地手持宪法，申张自身权利时，不知他有没有醒悟：延安整风自己向党的领袖山呼万岁时，已经为文革种下了苦果；不知他有没有想到，当数百万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民族精英，不经审判即被流放关押时，有没有人申张他们的宪法权利；不知他有没有料到，当他在庐山卖力批判彭德怀时，甚至当他举手同意整肃“彭，罗，陆，杨”时，已经注定自己同样悲惨的下场；不知他有没有反省，就在“四清”中甚至就在一年前，他派出的工作组，在农村、工厂和高校，又迫害了多

少无辜群众，其中也包括后来成了文革罪人的蒯大富们；甚至我们还可以揣测：此时他有没有羡慕和向往，有媒体或者街头可以就文革开展辩论，有议会或者法院可以申张正义，有选举或公决可以听从民意，决定胜负……

洞察“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苏洵，在《管仲论》里又说道：“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文革之祸早有由兆。文革和此前一场场政治运动，高举的是同一面蔑视人权和生命、鼓吹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思想旗帜；依赖的是同一块个人专断、践踏法治的制度土壤；运用的是同一套群众运动残酷斗争的手段；文革依靠的主要打手，也还是延安整人的康生、反右的棍子姚文元、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反修论战的先锋王力。文革前的一场场政治运动，早已铺就了通往文革之路。

对社会灾难起因的反思和认定，可以照见时代的智慧和良心。文革后陆定一、周扬等大彻大悟反躬自问，闪耀着老一辈的良知和真诚。而遇危机则归咎“外部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有动乱即声称系不明真相群众受别有用心之人欺骗，惟独不肯面对现实检讨自身，正是缺乏自信良知泯灭的表现。讳言文革真实原因的代价，不仅是执政者政治诚信资源的丧失，更危险的是始终讳疾忌医，则沉痾再发势所难免。错判病因固然会庸医杀人，不查明安全事故的真实原因，要防止事故再次发生，正如西谚所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对重大政治“事故”的真实原因采取鸵鸟态度，必将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清末迭遭外侮危机深重，昧于政治革新的专制维护者，认定只是船不坚炮不利，应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望办洋务拯救帝国却加速王朝覆灭。六十年代初明明是旗帜三面饿殍千万，却对外谎称是“三年自然灾害”，对内刘少奇的报告归咎地方的“分散主义”，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领袖，则一如既往地认定是阶级敌人破坏、民主革命不彻底，由此发起文革的前奏“四清”。苏共二十大揭露了集体化和肃反的灾难，但仅仅把原因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启动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最终积重难返苏联顷刻瓦解。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执笔《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苏联历史灾难归咎斯大林个人错误的，正是后来主持起草决议，把文革原因又说成是领袖犯错、坏人利用的胡乔木。《再论》写到：“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触及要害的深刻提问，却给出了今天看来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他（指斯大林）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当年的八届二中全会公报则断言：“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历经四分之一世纪的风风雨雨，所谓第一支笔的僵化思维，居然没有半点长进。竭力撇清苏联大清洗、中国文革与政治制度的内在关系，良苦用心可谓一以贯之。如果说当年我们无缘读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百年国际共运史的血雨腥风也不甚了了，更没有经历过文革劫难，相信了第一支笔的自欺欺人之言。那么今天我们已然明白：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领导人的错误总要酿成巨大灾难。无论在阿尔巴尼亚还是朝鲜，所谓坏人总会出现于领导核心，不断产生又被反复清洗。文革要说有所贡献，或许就是政治神坛之上，过去庄严的偶像被从此击碎。目睹了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仓皇出逃，觊觎接班人的薄氏野心家道貌岸然却五毒俱全，比戏剧还精彩的官场丑闻、前赴后继的贪腐政客，难道我们还会天真地相信，庙堂之上尽皆天使和救星。还会轻率地把国家兴衰、百姓命运，仍寄托在领导人不会犯错、不出坏人的天方夜谭上吗？所谓领袖犯错和出现坏人，不过是专制制度人格化的载体和表现。薄熙来罪行的暴露虽系偶然，但却又一次雄辩地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既不能阻挡劣迹斑斑者登上高位，也不能防止位高权重者胡作非为。为防止灾难卷土重来，唯一靠得住的是，让公仆们的任免去留由民主决定，把公共权力关进宪政的制度之笼。万一领导人又“冲昏了头脑”，则尽快把他赶下台，而不是继续高呼永远健康万寿无疆。

汶川之难，总理曾引“多难兴邦”的典故与国人共勉。然揆之史实，无论是春秋之际灾难频仍的楚灵王，还是李鸿章在遗折中以多难兴邦为之打气的清王朝，并未曾因多难而中兴。日寇侵华之难，虽有人当成机遇作无耻感谢，但中华绝非因此而兴邦。观之现实，频繁发生的矿

难、水灾，也未使预防工作自然得到切实改进。要实现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必须深刻反思、认真总结灾难的教训，其前提又是必须真诚面对灾难的史实和原因。反之，如果以“宜粗不宜细”搪塞敷衍，借口“团结一致向前看”，推卸弄清真相总结教训的历史责任，则侈言“多难兴邦”，只能是欺人之谈。遵义会议因军情紧迫，对军事之外的其它错误并未清算。但到了1941年，面对抗日、国共合作、共产国际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回避历史上的错误及原因，就不可能明确和统一今后的路线方针。从确立领导权和夺取政权的角度，延安整风前期对历史问题的回顾和清算不可或缺。在反思历史教训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亦居功至伟，中国社会由此获得三十年巨大进步。但囿于当时人们的认识局限、稳定局面经济建设的迫切、以及历次党内斗争老一代恩怨的盘根错节，并没有对文革及之前的错误，进行系统深刻的检讨和反省。今天当我们又为不断积累的新旧矛盾所困扰，为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寻找路标时，必须象延安整风前期那样，补上反思文革、全面总结历史教训这一课。让文革真相大白天下重拾社会信任；反思文革病因明确改革方向；检讨文革的制度积弊制定改革措施；清除文革的思想余毒求得改革共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告别文革，推动改革再次出发；才能告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冤魂；才能坦然面对尊重历史的文明世界；对于终究要拷问历史真相的子孙后代，也才能真正做到问心无愧。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新世纪的十字路口才不致迷失方向、蹉跎徘徊更不致复辟倒退。我们的后代再说到“多难兴邦”时，庶几可将我们今天的努力，作为光荣而不是梦想，记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 原载《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 【劫后反思】

###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0 5 a，第三章 文革爆发蒋南翔倒台工作组反崩（1966.6—1966.8））

#### 第九节 王光美卖饭打菜，一次反胃的政治秀

王光美虽然是清华工作组的成员，又一直在清华蹲点，但是对像我这样的普通学生而言，几乎听不到她的消息，见不到他的身影，不知道她的存在。

7月18日，如火如荼的反崩斗争突然刹车，紧急转回斗黑帮。这一来，让那些紧跟工作组的积极分子们措手不及，中间群众对此也顿生疑窦。当怀疑工作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暗流涌动的时候，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成员的消息不胫而走。

7月30日，中饭时间，我已经打好饭菜正在吃了。忽然，就餐的人群骚动起来，听周围的人在说：王光美来卖饭了。

匪夷所思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到清华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食堂卖饭来了！

我顺着大家的目光扫视过去，发现有好些同学都涌向食堂的西北角。那些还没有打饭菜的同学都跑到王光美的售饭点上排起了长队，想一睹她的风采。其他几个售饭点上卖饭打菜的师傅也伸长了脖子往那里瞧，他们面前买饭菜的同学已经少得可怜。

那时候，九饭厅的售饭点很简单，就是在一张条桌上放一筐箩的馒头、窝头再放一大搪瓷盆菜。

我看到王光美系着白围裙在打菜，主食由其他的大师傅卖。

王光美是名门闺秀。我想即使她在桃园搞“四清”，与老百姓搞“三同”，也只是摆个姿态，不会真正出力气的。这次来食堂打菜，对她来说，肯定是相当重的力气活了。不多一会儿，那只打菜的手腕似乎有点力不从心。本来是单手打菜的，后来经常需要另一只手来帮一下了，就像打网球那样。

边上的大师傅见状，想来替下她。要是她只站在旁边看大师傅打菜，那算什么“劳动”呀？于是，头脑还算活络的大师傅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大师傅打好菜以后，让王光美再用筷子夹上一点菜——加菜。

我倚着墙角端着饭碗远远地看着，欣赏着平生难得一见的秀场。看到她这种做做样子的劳动，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做秀”，心里觉得直反胃。

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随行的记者拍照录像。要是在现在，肯定要在媒体的头版头条大肆宣传一番的。

“有人呼：‘刘主席万岁！’王光美默许。”这是记录在清华文革大事记上的话。我在现场的时候，没听到有人呼这样的口号。可能是我走了以后有人这样呼过，也可能是她在别的食堂卖饭的时候有人呼过。不过事后在大字报区，吹捧王光美的大字报还真不少。说什么贵为国家主席夫人，屈尊下基层为学生打饭卖菜，体现了中央首长对清华文革的巨大关怀，云云。

王光美不时露面来食堂卖饭这些不寻常的举动，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三同”那样简单的作秀，她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信息是：我是清华工作组的，我是刘少奇的夫人，我就是工作组的幕后老板，清华文革是刘少奇亲自抓的点，你们还怀疑什么？你们怎么可以怀疑工作组是绝对正确的呢？

这是王光美眼看工作组的处境不妙而不得不亲自出马所做的一次挽救行动。

当然，我并不是当场就有上面这些想法，而是过了好些天以后才慢慢悟出来的。

人们总说王光美出身书香门第，是辅仁校花，对她高雅端庄、光彩照人的仪表赞不绝口。但是，她的食堂亮相给我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此。那天，我是第一次亲眼近距离见到王光美。而且，当时我还没有听到有关刘少奇的一点点传言，对王光美也没有一点点怀疑。她的形象，说实在的，粗一看，真与食堂里卖饭打菜的女师傅无异。只不过看上去身材较高，有点丰满，微露龅牙，肤色白净，但是看不到知识女性的那种气质。如果换上旗袍戴上项链，给人的形象也不过是雍容华贵而已。

王光美以后的故事还很多，众人褒贬不一。我作为一介平民，对她在刘少奇落难之后的不离不弃，还是很赞赏的。对她将刘涛（自9）逐出家门、将蒯大富赶出北京的行径，则很不以为然。

第十节 我居然想参加“自控系红卫兵”，自不量力自讨没趣

清华附中是中国红卫兵的发源地。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既然伟大领袖对红卫兵是如此的支持，于是，近在咫尺的清华大学校园里随即也出现了红卫兵。

清华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由刘菊芬出面组织的“自控系红卫兵”。七月底，它筹建的海报贴在12号楼附近。

我一看到是刘菊芬在负责筹建，很高兴。她是我“四清”工作队的队长，老领导、老熟人了。

毛主席支持的新生事物，肯定没错，我也想做一个“红”色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小“兵”。看到申请条件中有一项是“红五类”子弟，我完全符合条件。我想，参加红卫兵肯定不成问题。

找到刘菊芬，我对她说了来意。她对我笑笑，不置可否地哦了两声。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直到8月4日“自控系红卫兵”正式成立。

这件事让我对刘菊芬的亲切感陡然减少了许多。吃闭门羹的滋味不是那么好受的。

后来想想，也真是的，我对刘菊芬的印象很好，不见得她对我的印象也好。在“四清”中，我在对敌斗争中不时表露出一些“地主富农分子看起来已经比较老实了”这样的右倾思想，工作办法不多，对所依靠的积极分子的看法摇摆不定，包队任务完成得不怎么好的。仅仅因为“三同”做得还不错，她对我能有很好的印象吗？就凭彼此比较熟悉就会同意我参加红卫兵吗？要是她再稍稍了解一下我对工作组不满的现实表现，很可能她会在心里说：亏你老孙想得出来，想参加我组织的“自控系红卫兵”！

“自控系红卫兵”的基本骨干都是革干革军子女。即使是工农子女，他们能瞧得上眼允许参加的也是极少数。这样一支脱离一般群众、甚至脱离大多数工农子弟的“贵族红卫兵”，仅凭这一点，它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我当时根本就没好好了解“自控系红卫兵”的真实宗旨是干什么的。还自以为只要是根红苗正的贫农出身，他们就会吸收我。没过多少天我才知道，原来“自控系红卫兵”是拥护工作组的。天哪！我怎么会想去参加这样一个红卫兵组织啊？全清华再也找不出比我更冒傻气的人来了吧？

我把这样一件会让人笑死的糗事抖落出来，只是想告诉大家，我这个人在政治上是多么的幼稚无知，多么的滑稽可笑！

三十年后，刘菊芬已经是四通公司的副总裁了。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时到她的办公室去拜访她。她给我的印象依然是“四清”那个时候的刘队长，真诚热情、和蔼友善。

## 第四章 “八八”勇斗“八九”（1966.8—1966.10）

### 第一节 工作组败走清华，“八八”“八九”争雄

反蒯斗争是紧急刹车的，工作组的撤走也很突然。这是上层政治权力较量的结果。作为普



通学生，只感到这两个月的政治风云，诡异多变，无所适从。

7月28日，北京市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临走前，扶植了一个“临时筹委会”，由它来领导清华的文革。

8月4日晚，周恩来率领一大批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高级干部参加了在东大操场举行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

会上，叶林做了一个浮皮潦草的检讨，新市委也做了检查，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首长都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学生的发言依旧是互相攻击、揭老底。一位“自控系红卫兵”姓蔡的女生在大会发言说，她看到蒯大富猖狂向工作组夺权向党进攻，肺都气炸了！第二天，“肺都气炸了”成为清华大字报区最醒目的一句流行语。

周恩来听取了两边激烈的争辩后，在会上做了重要的长篇讲演。

这是我第一次不是靠传达而是亲耳聆听周总理的报告。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心情无比激动。

他首先指出“工作组的方向都错了”，“犯严重错误的方向上去了”。他称蒯大富为“同志”，宣布“对蒯大富案件和刘泉案件，我是主张解放和平反的”。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有一种“天亮了”、“翻身了”的舒心。

周恩来在大会上还公开承认“上面要负责任”，“我也应当向大家，向受了委屈、受了不平等待遇的同学赔礼道歉”。这让我非常感动，再次让我见识了一位襟怀宽广、从不推诿责任的伟人。

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清华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斗批改’方向上去，要实现三大任务，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楚，我想是必要的。”

大会以后，因工作组的反蒯运动而遗留下来的学生间的对立情绪实在太严重了，周恩来的讲话不仅没有缓和对立情绪，围绕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的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

一批人认为工作组已经检查了，可以过关，下面应该立即斗黑帮。另一批人认为不先把工作组的错误批深批透，消除同学之间的严重隔阂，怎么能万众一心斗黑帮呢？而“临时筹委会”提出的建议是，“根据大多数人意见尽快打黑帮”。

坚持要批工作组错误的这部分师生串联起来，于8月8日成立了一个“八八串联会”，领军人物是唐伟（工化00）、陈育延（力00）、吴栋（自9）等。要立即斗黑帮的那部分师生，不甘示弱，第二天也组织了一个“尽快打黑帮串联会”，后来简称“八九串联会”。

8月19日，在“自控系红卫兵”的基础上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头面人物是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高干子女。它的外围组织就是“八九串联会”，所以这个红卫兵的别名又叫“八九红卫兵”。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8月22日，唐伟等也组织了一支红卫兵，取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它的外围组织就是“八八串联会”。

“八九”派的观点，表面上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是斗学生而不是

斗黑帮，改正工作组错误最实际的行动就是立即转为斗黑帮。

我是坚决支持“八八串联会”观点的，自认为是个坚定的“八八”派。我当时写过大字报，认为是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造成了一部分师生与另一部分师生之间严重的对立情绪。工作组拍屁股一走了之，它的错误不彻底批判，它遗留的恶果不彻底清算，对被错整的蒯派不道歉不恢复名誉，在这样的局面下，怎么能同心合力斗黑帮呢？

两种不调和的意见，各有各的道理。周恩来先说“清华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斗批改’方向上去”，接着又说“要实现三大任务，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楚，我想是必要的。”周恩来把两个方面都讲到了，圆滑全面，无懈可击。如果强调前者，就是“八九”派的观点。如果强调后者，就是“八八”派的观点。“八八”与“八九”都能从周恩来的讲话中找到依据，所以各不相让。

为什么“八八”、“八九”会这样严重对立？这就要追溯到工作组时期这两部分人的不同表现。

工作组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反蒯。反蒯结果，整出了虽说是“一小撮”却有七八百人的蒯派。全校一万多名师生员工都是跟着工作组跑的，都参与了反蒯运动。

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工作组反蒯的。但是非常积极的也只是一部分。“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八九串联会”的头面人物和骨干分子都是工作组倚重的对象，是反蒯的领导力量。工作组撤走的时候被扶植上台，掌握着清华的实权，他们工作组是有感情的，他们不愿意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也不认为工作组有多大错误。他们还是坚持蒯大富是反革命，蒯派该整。他们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许多积极反蒯的群众，一时也难以从心里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他们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就是批判他们自己，这个弯子不好转。他们不愿批工作组的错误，于是就提出打黑帮，于是就结成“八九”。当时，“八九”派人数众多，是绝对的主流派、多数派。

在跟着工作组跑的人中，有很少一部分，他们对反蒯是有看法的，他们不满意工作组矛头向下整学生的做法。只是在反蒯的浪潮中，他们不敢正面顶撞工作组，不敢公开自己的想法，他们害怕一旦工作组发现他们有心会被当做蒯派挨整。现在，工作组撤走了，中央明确性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他们没有了工作组的外部压力，又有了周恩来讲的撑腰，他们胆壮了，于是就起来批判工作组。这部分人就成了“八八”。只是，他们是处于劣势的少数派。

八月中旬的那段夜晚，灯火通明的大礼堂大字报区，我经常能看到唐伟与人辩论的情景。看着唐伟清秀瘦高的个子，那敏捷的思路，滔滔的辩才，以及我深为赞同的观点，站在外圈伸长脖子围观倾听的我，只有仰视的份儿。他是最低年级的，个子也比我要矮一些，所谓“仰视”，那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对他佩服得很。我偶尔也看到唐伟与陈育延挎着军绿色的书包，行色匆匆地穿行在校园里，很像是一对金童玉女。

蒯派挨了工作组的整，对工作组当然是恨得要死。工作组倒台了，最兴奋的莫过于蒯派。所以蒯派持有“八八”观点是很自然的。但是，即使是共和国的总理亲自为蒯大富平了反，蒯大富和蒯派的处境依然十分艰难。不仅“八九”派仍然坚持蒯大富是向党夺权的反革命，即使是在“八八”派里，相当多的人也是认为蒯大富即便不是反革命，即便整他是错误的，蒯大富也算不上是什么好东西，更不是什么革命左派。蒯大富依旧是臭烘烘的没人理。蒯派这一群体在“八八”里也没有什么说话的份儿。

八月的清华，就这样进行着“八八”与“八九”的大论战，进行着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大搏杀。

少数就意味着孤单，意味着受压。

那时的我，在班里一直忍受着游离于多数派主流派之外的孤单、郁闷和痛苦。真盼望能有一次痛快宣泄的机会。

## 第二节 一气呵成《少数赞》，激愤之下成名作

8月22日，我听说“八八”即将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八九”刚成立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相抗衡，兴奋异常。那天中午午休，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反蒯以来感受到的压制与抗争、不公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

我想着，尽管我的观点属于少数派，但是，我反复审视，感觉自己的观点并没有多大的错。

忽然想到，在刚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我觉得这句话就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为我撑腰似的。

我激动得睡意全无。我非常想写点什么来抒发一个少数派的情感，宣泄一个少数派的情绪。我微闭着眼睛急速地打起了腹稿。等到全稿差不多拟就，我一骨碌从上铺跳下床来，伏在书桌上，奋笔疾书。一篇大字报就这样一气呵成。又修改了一遍，找来二张大字报纸誊写。随即，贴到大礼堂东侧两棵树中间的席棚上。

这篇大字报的题目，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少数赞》。

《少数赞》并没有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表达具体的观点和评论，它仅仅如实记录了一个少数派受压时孤立无援的复杂心情和内心感受。或许，正是因为碰触到情感这一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所以才引起不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给他们以困境中的鼓劲，坚持中的加油，由一个人的自我壮胆感染成一群人的相互慰藉。

对我而言，《少数赞》是我的“成名作”，是它使我在校内为一部分人所知晓，此后我文革中的各种机缘都是由此而引起的。

我在文革中所写的文章、发言稿全都丢失或销毁，这一篇《少数赞》因为收录在《大字报选编》里才得以保存至今。全文篇幅不长，按《大字报选编》里收录的刊载于下：

### 革命少数赞

毛主席语录本第222页：“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有言在先：革命少数赞，赞的是那些坚持正确观点，暂时处于少数地位的革命同志，而绝不是指仅占人口百分之几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至于有一小撮别有用心混蛋们，他们想利用本文为它撑腰，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乃至炮打无产阶级的司令部，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的阴谋也一定不能得逞的！）

多数常常是正确的！

而且，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在党的纪律中，规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因此，一般地，人们希望自己成为多数派，而不愿意成为少数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必须注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当真理处于“萌芽状态”，仅被少数先进分子所掌握时。正因为如此，十六条明文规定：“保护少数”。这可以说是多数派享受不到的一种光荣权利！然而，少数派确实不大好当的。

你看：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时时刻刻地检查自己：我是否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是否全心全意地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句话，是否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尤其必须拿出十倍的精力，用心地读毛主席的书。他必须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十六条、符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依然无限地信赖群众。他要受得起委屈和误会，经得起种种打击。他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那些他认为是坚持了错误观点的同志。他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迁怒于多数派。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而始终把握住运动的大方向！

当他处于少数时，他必须更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判断。他恨不得自己多长十双眼睛十张嘴，十个脑瓜子十条腿，便于多看、多问、多听、多想。他恨不得一天等于四十八小时。他常常食不甘，觉不香，为真理而终日奔波辛劳！

当他处于少数时，也可能是他的个人杂念会猛抬头的时候。什么委屈、误会呀，什么打击、帽子啊，什么前途、命运啊，……都会冒出来。他必须不疲倦地进行自我革命，清除这些脏思想。否则，他就坚持不住少数！他的少数意见，哪怕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一定会完蛋！”

当他认为自己的少数观点符合真理时，他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敢于坚持少数意见，坚持真理。那时，即使他“光荣地孤立”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当他发现自己的少数观点是错误时，他同样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于向真理低头，修正错误，而绝不能固执己见，或羞羞答答，不敢认错，更不能文过饰非！

然而，他并不甘心自己的观点永远是少数。他信赖党，信赖毛主席，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他相信通过顽强的大搏斗，能发展成多数、大多数、绝大多数，达到让真理改造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

如果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还必须在新的矛盾中，成为符合真理的新的少数！

符合真理的少数，不论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曲折，它必将发展成多数。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

因为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战无不胜的！

因为真理属于无产阶级，它是新世界的主人！

革命少数派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顽强得很！彻底得很！可贵得很！一句话，好得很！

我们每一个愿意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革命同志，要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要敢于成为少数，要善于改变自己少数派的地位！

那些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甚至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当然多数派”的性格，是不能与我们相干的。批判！斗争！革命！造反！这就是我们的格言！

让我们经常在少数派的风浪中，摔打滚爬，担风险、经风雨，锤炼出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钢筋铁骨、永不变质，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紧地接过来，牢牢地传下去的一代新人！

清华大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 孙怒涛（原名：孙银基）

初稿发表于 66. 8. 22，第一次修改于 66. 9. 26

附记：（1）本文时代背景：“八八”革命串联会在坚持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为革命的造反精神翻案的斗争基础上，于八月二十二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他处于少数地位。本文是献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大会的。本文原名为：“少数赞”。（2）本文作者：清华大学自动

控制系604班学生（住址12—420）贫农、团员。

清华大学自控系“红色服务兵”翻印

1966.9.28

尽管我所说的“少数”就是《十六条》中所说的群众中有不同意见的“少数”，我还是怕有人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在为“地富反坏右”这样的一小撮“少数”歌功颂德，所以才有了开篇的“有言在先”。这多余的表白，还有“贫农”、“团员”这些身份的宣示都暴露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十分胆小谨慎，甚至有点战战兢兢的。

这篇大字报是我当时不吐不快的激愤之作。写完贴出之后，想说的话说完了，想吐的气吐出去了，想宣泄的情感也宣泄完了。我当然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去看它，要不也不会贴到大礼堂的中心大字报区。至于会有多少影响，多大效果，这些，我当时一点也没想过。

后来好些蒯派和“八八”派对我说，那时他们同样正受压，正憋气，看到这篇大字报，眼睛一亮，很受鼓舞，感觉是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我被这批人引以为“同志”，视为知己。

遗憾的是，这篇大字报在8月24日的“红色恐怖”中被撕毁了，它的寿命仅仅只有两天！

一个月以后，学校的大字报选编组找到我，说想收录这篇大字报，问我有没有意见，需不需要修改。我仔细地审阅了一遍，没对正文做任何改动，全文有三处修改（文中有波浪线的字即为增添的内容）：

一处是，有些同学认为我即使“有言在先”，但是笼统盛赞“少数”，还是可能授人以柄。我接受他们好心的意见，把标题改成《革命少数赞》。加了“革命”这个限定词，增添了标题的革命色彩，那么“少数”就再无歧义了，也不会被“少数”真正的坏人利用了。那个年代，“革命”是最时髦最流行的，用得越多就越显得自己革命。“革命”就像一件外套，什么东西套上了“革命”两字，就显得革命多了，也保险多了。

另一处修改的是，因为我已经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已改名，所以把文章的署名改为“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孙怒涛（原名：孙银基）”。

最后一处是我写了两点附记，交代了这篇大字报及我这个作者的背景。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篇曾经自鸣得意过的大作，心里想，这算什么文章呀？既没有闪光的思想，也没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凡见解，更缺少华丽的文采，不朽的警句，文中还夹杂着“狗屎堆”、“混蛋”这样的不雅用词。充其量，这不过是一篇表达当时心境的小杂文而已。

时过境迁，不要说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那个年代所写文字的语境，即使作为作者的我，也无法从中嗅出当年紧张激烈的时代气息了。只是当时写作时的心潮澎湃，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虽然是一篇不起眼的小杂文，在当时，还真是一篇广为流传的大字报。

由于清华的《大字报选编》在全国的影响力，我在文章的“附记”中公开了我的通讯地址，所以打那以后，我收到不少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信中写着他们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并且深受鼓舞。我还收到好些学生寄给我的红卫兵袖章和毛主席像章这类纪念品。好几个友人告诉我，说在大串联的时候，在外地也看到过这篇多次传抄的大字报。四十余年后

的今天，我还能在网上检索到《革命少数赞》的踪迹。

### 第三节 赶潮流学时髦，改名“怒涛”

我的名字是在8月底开始的破“四旧”浪潮中改换的。

父母给子女起的名字，或多或少都带有祈福求富保平安的意思。在名字中有个“富”呀“贵”呀什么的，这很常见。但到了文革初期扫“四旧”的时候，这些“富”“贵”都认为是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货色了。地名在改，街名在改，人名也在改。革别人的命不是那么容易的，革自己名字的命，只要自己愿意，谁都可以做得到。于是，不少对自己的名字不太满意的同学改成“向东”、“卫彪”，甚至“宁左”、“井冈山”之类的革命名字了。

我的原名叫孙银基，因为我的同辈堂兄弟都是以“银”字排行的。以革命的眼光审视，“银”，就是银子，就是金钱，与政治挂帅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还要以“银”为“基”础，这名字显然散发着太浓的铜臭味儿。把这样的名字签在大字报上，感觉有点难为情，不合潮流，于是就萌生出改名的念头。

其时，我的“怒涛”战斗组因为观点的分歧已经不太出大字报了，但是还常在一起活动。我们五个人对于共同度过的这一段艰难的不平常的日子都非常怀念，对于“怒涛”这个“窝”也很留恋，对“怒涛”这两个字同样倍感亲切。在议论外界轰轰烈烈破“四旧”的时候，我们约定，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怒涛”，以兹留念。

于是，我就成了“孙怒涛”。这名字，念着磅礴大气，想想豪情万丈。在9月26日对《少数赞》进行第一次修改的时候，我签上了已经用了好几天的新名字。这名字随着《革命少数赞》的流传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其他的几个同学，后来有的改名了，有的最终还是没有改。即使改了名的，可能是觉得在名字中用这个“怒”字实在不合适吧，于是就变通了一下，改成较为温和中听的“洪涛”。就我一人，“怒涛”到底。

1980年，文革已经结束了。一看到这个带着“怒”气的名字我就觉得这也是文革的“余毒”，越看越看不上眼。趁着工作调动的机会，我又想把名字改回来。我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户口本上的名字改过来，到新单位报到的时候就能用原名了。于是，给派出所的经办民警说了一通好话，终于在户口迁出证明上改成原名。到了杭州，哪知道接收单位不认账。新单位的领导说，调令上写着的是“孙怒涛”，我们不能接收“孙银基”。左说右说就是说不通。没法，我只好再跑到迁入户口的派出所，对办事的民警又说了一箩筐的好话，请他在入户的时候仍旧用那个新名。这正是，想赶潮流学时髦，聪明反被聪明误，典型的瞎折腾！

前些年，曾有友人打趣我，说你们“大清帝国”的涛哥真不少呀！我自嘲：此涛哥非彼涛哥也！彼涛哥前程似“锦”，此涛哥名落“孙”山。这名字凶巴巴的，已经不合新倡导的“和谐社会”大潮了。友人拍拍我肩膀安慰我：好在你“名不副实”，模样看上去还没像名字那样“怒气冲天”。

可见，浅薄的赶潮流是会留下笑柄的。这就是明证。

我不得不佩服蒯大富在改名这件事情上，不随波逐流的独特个性。

这个“蒯”字，我读《三国演义》《史记》的时候曾经见过，知道是姓，但不知道怎么念。懒得查字典，就遵循“白字念半边”的不成文规则，我默念读作“朋”。

当大字报上见到“蒯大富”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念成“朋大富”了。可是大喇叭里工作组使劲批判的那个“大富”不姓“朋”的，才知道这个“蒯”字应该念成 kuǎi。我想，在清华，像我这样的白字先生可能不止我这一个吧？我的好朋友汲鹏（压 0 0）曾调侃老蒯说，把“蒯”由冷僻字普及为常用字，这绝对是老蒯对文化大革命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如果说，我的名字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话，那么“大富”这个名字更是赤裸裸地在宣扬“封资修”了。早在 6 月 19 日，“胖老头”30 薄一波就对蒯大富说这个名字“不太好”，是“想发家致富啊”？甚至批“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名字”。在破“四旧”的浪潮中，那时蒯大富已经不算反革命了，许多人都写大字报，强烈要求蒯大富改名，有的甚至要求他把姓也改了，说这样一个谁也不会读的姓难道是要故意刁难全国的劳动人民不成？蒯大富面对一片要求他改名的另类浪潮，始终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

我想，蒯大富之所以能成为蒯大富，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刘少奇正好选中清华当做他的新“桃园”注定了清华必然要出一个“×大富”；王光美蹲点的系正好就是蒯大富所在的工化系；王光美要来参加蒯大富班的座谈会又正好发生了点不大不小的误会。这些全都是巧合，是蒯大富之所以能成为蒯大富的外在的偶然因素。蒯大富从高中到大学，热衷于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有赶大潮流的强烈意识，但是不为小潮流所动，坚持独立思考，不畏强权，不惧高压，这些在文革初期的蒯大富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和品德，是使蒯大富之所以成为蒯大富的内在的必然因素。

#### 第四节 似是而非的对联，掀起血统论恶浪

8 月初，“北航附中红卫兵”一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搅动了全北京，也搅翻了清华园。大字报区，宿舍里，到处都是有关这副对联的辩论。

有人说，这副对联好得很，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有人说，这副对联好个屁，宣扬的是封建主义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能打洞”的血统论。

如果对联就只是这上下两联，我想，绝大多数人还是能一眼看穿这副对联是错的，是宣扬血统论的，辩论就不会如此的激烈。

问题是，我所见到的对联，并非只有上下联，还有一个横批，叫“基本如此”，外加放在对联“门”中间的条幅，叫“鬼见愁”。意思是说，不是绝对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但基本上都是这样。只有心中有“鬼”的人“见”到这副对联才发“愁”。

“鬼见愁”的恫吓对我不起作用。但是，“基本如此”的辩证说法迷惑了我。于是这副对联看上去就变得似是而非、是非难辨了。

当时，党的阶级路线的标准提法是三句话：1、有成分论；2、不唯成分论；3、重在政治表现。大学六年，经过多次的政治学习，我已能把这条阶级路线背得滚瓜烂熟，几十年后，还能一字不差。

拿对联与标准提法相比较，上下联的意思就是“有成分论”，横批中包含有“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意思。当然，对联是一种易记、通俗、简洁、形象的表达方式，与三句话

准确严密的表述还是有点差距的。所以对联并不是阶级路线完整的、严肃的表达，但我认为对联并无大错，基本正确。

8月2日“晚上，全校关于对联的辩论轰轰烈烈进入白热化阶段。刘菊芬主持会议，说：‘这个对联完全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对联从精神到内容都是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我对刘菊芬这样高调的说话并不认可，这话说得太绝对了。但是我同意对联本身基本上“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大体上“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改变了我的最初观点。大礼堂辩论的时候，谁站到讲台上，首先就是要报出身。不主动报的，台下的听众就齐声喊，逼着你报出身。听到“革干”、“革军”，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听到“工人”、“贫农”，掌声就差一大截。要是“中农”、“职员”，掌声就稀稀拉拉的了。出身不好的，没几个人敢上台的，即使上台也要被嘘下来。每当听到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喊：“黑七类子弟算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还出现了“横扫一切浑蛋”的口号。总之，在客观上，最实践中，这副对联已经没有“基本如此”的遮羞布，只剩下赤裸裸的血统论。高干子弟趾高气扬，其他的畏首畏尾。出身剥削阶级的，龟缩在宿舍里，连出门都需要勇气。这副对联造成的“红色恐怖”，连我都感觉到很大的无形压力，更何况是出身不太好的同学。

把全校、全社会都卷入到对联的辩论中，不符合中央文革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于是，江青出来讲话了。她说：“我们觉得这样改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并说：）不应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对联引发的风潮平息下去了，但是因对联造成的政治上的压制和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难抚平的。

对于阶级路线，文革前我就一直在想：连三句话都有点多余的，其实就“重在政治表现”一句话已经可以概括一切了。党认为表现好的就依靠、就重用，党认为表现不好的就教育、就限制使用，还要前面的二句话干吗？后来我慢慢地琢磨，觉得自己想通了。光是“重在政治表现”，这标准不太好掌握，随意性太大。先讲“有成分论”，那就像是划了一条粗杠杠。成分好的，基本上就是要依靠重用的，成分不好的，基本上就是不能依靠重用的。然后，用“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再开一个小口子。成分好的，如果政治表现不好，就可能不被依靠重用；成分不好的，如果政治表现好，也能被依靠重用。当然，这些都是极少数。这样，阶级路线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贯彻了。

在文革之前，我从来都是想怎样正确理解阶级路线，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样的阶级路线是不是有问题，究竟是错还是对。

文革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文革把左倾路线推至极左。文革前的阶级路线是左倾的，文革初期出现对联这一怪胎，同样把阶级路线由偏激推至极端。对联这样的血统论虽然退潮了，极左的阶级路线在文革中一直是盛行的。文革结束后，太子党、官二代的兴起，说明某些“马列主义者”坚持的仍然是丑恶的血统论和世袭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在一百多年前寿终正寝了，但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要肃清还需极大的努力。

## 第五节 周恩来再来清华园，我有感动也有不满意

8月22日晚上，周恩来再次来到清华大学，还是在东大操场上，冒着雨对全校师生员工做了一次精彩的讲演。

是什么原因让他与上一次来清华讲演相隔仅只18天又一次来到清华？



可能是因为受毛泽东之托过问清华的文革，所以他要格外的尽心在意？可能是因为中央全会已经开完了，他要把会议的精神尽快地传到清华，并通过这里传播到全国？可能是因为他对清华这段时间的运动不是很满意，所以来指明方向？

今天我仍然搞不清这些原因。不管怎么说，他是代表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来关心清华的文革，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凡是参加这次大会的清华师生和外地来京串联正好在清华的群众，无不为周恩来在雨中坚持不打伞一定要与大家同风雨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与在场的二万多名群众一样，齐声高喊着：“请总理打伞！请总理打伞！”我们年轻，淋点雨算不了什么。总理那么大的岁数了，淋了雨生了病可怎么办？

周恩来谈到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他们已经做了检查，还可以继续检查。而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的中央同志”来负的。他代表工作组，也包括他自己，表示“赔礼道歉”。

周恩来要求大家学好《十六条》，把“全校的，全校各系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成立起来，充分准备好了，就可以斗以蒋南翔为首的黑帮了。

周恩来的讲话，向来都是这样，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只是，这一次我听了以后，感觉没上次那么的兴奋和激动。

会后，大多数师生认为周恩来的讲话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可以接受的。也有一小部分师生感觉他的讲话是抹稀泥，给人的感觉是工作组已经检查了，错误也批评了，下面再也不要在工作组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我的看法也是属于后一类的。8月4日的讲演，两个方面都讲到了，但是明确地指出了“首先要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批评，进行辩论，要把工作组的问题辩论清楚”。而这一次，周恩来认为工作组的错误主要是北京市新市委和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犯的，这个错误已经由中央全会解决了，所以下一步就应该成立领导文革的权力机构，进行“斗批改”了。我当时心里暗想，总理的讲话精神怎么与“八九”的观点这样相似的呀？

第二天，大字报区“贴出了几封给总理的信，表示不同意总理昨晚讲话中的一些意见（作者中哪个组织的都有）”。我在24日凌晨就贴了一张《敬爱的周总理，问您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可能就属于这“几封给总理的信”之一。我问他在8月4日大会上还不同意把蒋南翔揪回清华批斗而在8月22日大会上改变态度，是不是表示工作组的问题已经辩论得差不多了，下面应该斗蒋、斗黑帮了？我说我对此不理解。

今天再回头看看周恩来的这篇讲演稿，似乎在当时他并没有真正摸到毛泽东真实的思想脉络和意图。毛泽东并不满足中央全会上批评刘少奇的方向路线错误，不满足把刘少奇从第二号位置上拉下来。中央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周恩来上没摸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终目的，下又没有透彻了解因工作组反蒯而造成的情感隔阂和观点分歧是多么的严重，所以，他开出的这一帖药方注定是要碰壁的。

再仔细琢磨周恩来在清华的两次讲演，还能听出一些弦外之音。8月4日那次，他说“我们要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好战友，我们要保持晚节”。8月22日那次，他说“要做到老，学到

老，改造到老！”在听他讲演的时候，我深深地被他谦逊好学的态度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所感动。我不可能再往深细想下去。今天看来，在刘少奇倒台的前后这些天他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一再地在向紫禁城里的毛泽东遥表忠心？

#### 第六节 8. 2 4 老红卫兵发飙，胆战心惊的红色恐怖

“八八”“八九”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再次讲话有所缩小。“八八”对他的讲话不是太满意，“八九”在两天以后搞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动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位从老二降至老八，大家知道了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挨批了，降职了。既然王光美是工作组的“组员”，那刘少奇不就是清华工作组的幕后指挥和后台老板吗？做这样的联想，提这样的疑问，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但是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略的。

8月19日凌晨，就在毛泽东身着戎装检阅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以后的几个小时，政治嗅觉敏锐而又无惧无畏的唐伟、陈育延、吴栋以“向日葵”战斗组之名贴出了轰动全校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8月22日，又贴出《刘少奇同志7.29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矛头所向，十分明确。

一时间，在大字报区贴了不少中央首长的大字报。有涉及到李雪峰、薄一波、陈毅等等的，也有几份对周恩来8月22日讲话表示异议的，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针对刘少奇、王光美的，其中甚至有《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这样重磅的大字报。

这些直接点名中央首长的大字报招致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极大愤慨。这些天来，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大字报区的动向，一直在制造“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舆论。现在，他们终于忍无可忍要重拳出击了！

8月24日下午，在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人的策划组织下，以“清华大学红卫兵”为首，纠集了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等十二所院校的中学红卫兵，在清华大学刮起了一场“红色恐怖”，名为反击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妖风，实为震慑敢于造他们老子反的群众。

那天下午，我正在礼堂大字报区转悠。忽然，从大喇叭里传出比平时高八度音播报的《最后通牒》和《安民告示》。“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谁敢阻挠我们大军，谁敢窝匪，我们就消灭谁”、“谁敢说毛主席、党中央半个不字，我们立即打断他的脊梁，焚尸扬灰。当剮千刀，罪该万死！”的叫喊声震耳欲聋。还勒令那些写中央首长大字报的作者缴出底稿和抄件，自行撕去大字报，否则，“红卫兵小将的铁拳头就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这讨伐檄文的杀气腾腾早把《安民告示》的一丝“温情”刮得无影无踪。

这边高音喇叭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咆哮，那边从二校门处涌进一大队高举红旗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一边高呼革命口号，一边雄赳赳地行进。

大字报区，有人拿着照相机不断地对那些疑似反动的大字报拍照留存，还有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撕大字报。大字报区顿时一片狼藉。

这股“矛头直指混蛋”、“狗崽子们”的大队人马犹如洪流，威风凛凛，气势逼人。所到之处，路人或在看大字报的人纷纷靠边，退避三舍。

我站在路边，看着潮头向我涌来，经过我的面前，向着大礼堂涌去。我一边看，一边不住地心里打鼓。想起清晨刚刚贴出的那份大字报，我想一定已经被当做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证拍照留存，只待秋后算账了。那“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好像就是冲着我喊的。尽管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心里想，在他们的眼里，我这样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右派学生。我真心想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我真心想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但是，“革命”、“造反”统统都是左派的专利。我要是想这样做，就不是“造反”，而是“翻天”了！我似乎又穿越到了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世道。这里不是说理的场所，也不是看热闹的去处。我立即选择了第三十七计——溜为先。虽不是落荒而逃，绝对像脚下抹油，赶紧溜回宿舍。

到了第二天，才知道头天晚上二校门被推倒了。

清华的二校门，她是清华园最著名的标志，也是我最喜欢的建筑。想当年，我就是被招生画报上二校门的英姿深深吸引而报考清华的。第一眼见到她，那感觉犹如一见钟情。到清华以后，我的第一张照片，也是在二校门前留的影。

我赶紧跑去，二校门已经不复存在。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有厚重浑圆的“清华园”三个大字。那块空空荡荡的地，就像是我空空荡荡的心。

听说那天晚上，学校里的黑帮分子（主要是学校党委和系党总支书记们）、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红卫兵抄家、抓捕、毒打，关押，受尽凌辱。在他们的皮鞭下，搬运二校门废墟的砖头石块。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被劈头盖脸地抽打。这些人平时从没有做过如此重的体力活，在抽打和呵斥声中，连滚带爬，哀叫不断，景象惨不忍睹。

恐怖，即使披上红色的、革命的外衣，也涂不上正义的色彩。无论是白色恐怖还是红色恐怖，都是把做人的尊严和权利予以强制剥夺的恐怖。

这场“红色恐怖”，喊的口号是镇压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右派翻天，干的实事是撕毁大字报威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的旗号是破“四旧”拉倒二校门，惩罚对象是黑帮分子右派分子反动权威。这批老红卫兵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至今仍众说纷纭。那些当事人仍三缄其口，不敢对历史做一个负责的交代。

8.24事件是清华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是红卫兵组织第一次以红色恐怖的名义进行文革的暴力事件。它像是一根耻辱柱，将面目狰狞血腥的“贵族红卫兵”牢牢地钉在其上。

八个月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在二校门的旧址上耸立起一座高大雄伟的领袖像——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尊巨像，据说在当年的中国是第一座。

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36，从伟人像的基座上铲除了，以图抹去人们头脑中深刻的记忆。

改革开放后，毛泽东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塑像被拆除，庄重的二校门又在原址上重建。

历史，总是螺旋形上升的。

第七节 勇敢的“八八”，逐渐迷失了方向

“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才五天就发生的8。24事件，是它最嚣张的“革命”举动，也是它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最疯狂的反扑。此后，这股保皇势力渐渐衰落，再也没有像样的作为。

作为它对立面的“八八”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政治高压下，一直高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批判“八九”和“清华大学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

但是，慢慢地，“八八”似乎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继续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吧，叶林已经做过检讨了，那诚恳的态度，连周恩来都被感动了，为他说了不少好话。况且，周恩来已经明确说了，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上面。工作组不过是执行错误，怎么能老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呢？

如果“八八”也开始斗黑帮，那与“八九”的主张又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了。

这时，大批学生开始离校去外地大串联。与火红的红八月相比，九月的清华园里显得有点冷冷清清。“八八”徘徊不前，有点举棋不定，难有作为。

我认为，此后的“八八”在两件事情上有所失误：

一件是，虽然“八八”召开过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的大会，但是，仅仅翻案到“工作组反蒯是矛头向下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为止。在对蒯大富翻案的问题上，“八八”没有新的建树。

“八八”的主要领导认为，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是工作组，给蒯大富平反的是共和国的总理。总理都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了，何必要“八八”再去平反呢？在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上，“八八”没有责任，在为蒯大富平反这件事上，“八八”也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尽管周恩来亲自解放了蒯大富，给他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包括“八八”在内的大多数师生并不承认蒯大富是一个好人，更不是左派。“蒯大富够不上反革命，也不能算是好东西”是当时大字报常见的一句话。而一些铁杆的“八九”依旧认为蒯大富是反革命。也就是说，蒯大富和蒯派，只是名义上的平反，并没有实质性的平反，并没有平反到位。他们依旧是臭烘烘的。

“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的要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就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都是好人，应该把工作组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冲洗干净。这是对“八八”的基本要求。

“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的要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还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与工作组的斗争是最勇敢最坚决的，他们就是革命左派。这算是对“八八”的高要求。

但是，“八八”连基本的要求都没做得很好，更别提做到高要求了。于是，在我听来，“八八”高喊“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口号，显得有点干巴巴、空洞洞的，没有落到应该落到的实处。

为什么“八八”会这样？究其原因，我认为“八八”这些人，在反蒯时期虽然对工作组的反蒯有所不满，但是基本上都是跟着工作组跑的。在“八八”的眼里，这些蒯派在工作组进来没几天就怀疑工作组，又没有什么让人信服的理由。而且，这些蒯派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可揪的辫子。他们根本就不认为他们反工作组是革命行动，他们是革命左派。能给他们平反就已经不错了。要承认他们是革命左派？没门儿！工作组的错误只不过是该在那个时候把蒯大富这些人整成反革命而已。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他们怎么可能为蒯大富和蒯派真正平反呢？

另一件事情是在对待蒯大富能不能参加“八八”的事情上。“八八”曾经主动邀请蒯大富同班的亲密战友，也是全校出名的大蒯派鲍长康（工化9）参加“八八”。鲍长康问：蒯大富能参加吗？答复是：他不行的。于是，讲义气的鲍长康说，既然你们不要蒯大富，那我也不参加了。据唐伟说，为加入“八八”蒯大富曾找过他，他回答说需开会决定。在“八八”的联席会议上，唐伟和陈育延的态度中立，其他几位核心激烈反对。于是蒯大富加入“八八”之事只好作罢。

如果“八八”真的能承认蒯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并把依旧处于困境中的蒯大富收罗在麾下，我想蒯大富对“八八”会心存感激的，蒯大富也不见得非另立山头，拉出一个“井冈山红卫兵”来不可。

唐伟见识非凡，勇敢聪慧，在坚决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在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同时没有为蒯大富等蒯派进一步平反，这是很遗憾的。我真为唐伟可惜了！他错失了一次站在文革潮头、引领清华文革、掌控运动领导权的极好机遇。

不仅如此，因为“八八”没有理直气壮地为蒯派彻底平反，没有果断地接纳蒯大富成为“思想兵”<sup>37</sup>，这也为日后蒯大富反唐（伟）反托（派）反“八八”找到了“理由”，同时，也为团派与414的矛盾分歧埋下了一个祸根。

我那时只是普通一兵，不了解“八八”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内情。据后来唐伟、陈育延批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的右倾和软弱无力，另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的举动来看，过于责怪唐伟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看好蒯大富，自会有人对蒯大富感兴趣。此后，心怀叵测的中央文革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频频与蒯大富或明或暗地接触。他们对蒯大富极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蒯大富是与以王光美、刘少奇为后台的工作组直接进行斗争的标志性人物，是一颗大有利用价值的棋子。面对以中央首长名义伸出的援手，任谁都不会拒绝。并没有彻底翻身的蒯大富绝非是一个甘于沉寂的平常等闲之辈，他总想在文革中有一番大的作为。这一拍一合，清华文革舞台上更精彩的一幕大戏就要开演了。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历史疑云】

有关林彪叛逃的四大谜题

• 时念堂 •

1971年“9·13”事件发生时，我正在空军专机师任师长兼驾驶员。林彪叛逃所乘

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及其机组人员都属于我师。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我和一些战友一直在从空军飞行专业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9·13”问题。

◇ “黑匣子”之谜

“黑匣子”是飞机飞行情况的整个记录系统，它主要有两个部件：一个放在机尾，是飞机状态记录器；一个放在机头，是飞机语音记录器，记录飞机上人们的谈话和其他声响。但是，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落后、我驻蒙使馆人员到达现场时，所有“黑匣子”都没有见到。究竟是人们没有找到它们、现在仍然抛弃荒野呢？还是被先我到达现场的外国人取走了？

以我们飞行专业的眼光判断，这些“黑匣子”一定还保存在某个地方。其根据是：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机尾是全机中最大的一块没有燃烧爆炸的金属物，据此可断定：装在这里面的飞机状态记录器会完好无损且不会被抛出去。在机头部位，盛着语音记录器的架子，也仍然完好无损，因此也可以断定：语音记录器“黑匣子”也不会损坏。

随着“黑匣子”这个“母谜”的出现，一些“子谜”也浮出了水面：一、256号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军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被炸死后，先是作为林彪死党和叛徒追查的。后来又将其定为“正常死亡”。那么，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企图把飞机开往别处？二、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子说了些什么？三、飞机上是否发生了争斗？四、林彪叛逃起飞后，周恩来曾经通过航空联络系统对他喊话，希望他回来，林彪没有回话。那么，林彪是否听到了周恩来的喊话？如果听见了，他是怎样表示的？

◇ 加油量之谜

飞机的加油量能明白地显示飞机要飞往哪个地方的哪个机场。加油量不能少，少了就达不到目的地；但加油量也不能多，多了还会影响飞行速度、高度和飞行时间，更会带来落地爆炸的危险。

林彪一家是在1971年的9月12日下午6点把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北京调往山海关的。在北京，要求机械师李平加油，加油量原定16吨而实际的加油量是15吨。飞机于当日下午6点半左右到达山海关机场，查看油量，还剩了12.5吨。这时候，潘景寅又叫李平把油量加大到17吨。但是，油车上的加油设备和三叉戟飞机上的加油设备不配套，油加不进去。当时，李平向潘景寅说明了情况，并请示是否采用别的办法加油。潘景寅思考了一下，说：不用了，明天早晨再说吧！

这一系列的加油量说明了256号三叉戟飞机不是飞回北京的。因为，到山海关这样短的距离其来回根本用不了这样大的加油量；也不是飞往苏联的。飞往苏联的油量，至少需要20多吨；只有可能是飞广州。从山海关到广州比从北京到广州稍远一点，所以加油量从16吨提高到17吨，中间不用落地加油。

第二天0点0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之后便开始了紧急行动。潘景寅指示给飞机加油，但是，仍然加不进去。正在这时，林彪的轿车开过来了。只见林彪被飞机上面的人拉着、被飞机下面的人推着，好不容易地上了飞机。之后，叶群急忙下令：马上起飞！还没等加油车完全离开，飞机就冲了出去。这时，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存油量仍然是12.5吨，这就向我们摆列出了一系列的谜：

一、林彪一伙逃跑，究竟原想逃往哪里？二、潘景寅非常清楚：12.5吨的加油量，只是飞往苏联实际所需量的一半。但他还是向苏联飞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 绕大圈之谜

飞机在空中飞行，航向是用“度”来标示的。按照顺时针方向，一周为360度。正北方为0度（N），正东方向为90度（E），正南方向为180度（S），正西方向为270度（W）。其他方向可参照这些正方向来确定。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按照正常的飞行程序，它必须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间转弯到航线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林彪外逃的航向，应该是325度），然后再继续爬高，到达预定的高度之后，再改为平直飞行。完成这个过程，三叉戟飞机只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然而，256号三叉戟飞机却用了20来分钟的时间：

第一阶段：飞机起飞的方向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一致，为244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稳定了四分钟左右；第二阶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又稳定了4分钟左右，这个航向，是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航向。第三阶段：航向从290度越过叛逃航向325度而到达航向340度。第四阶段：飞机稳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在空中画了一个硕大的问号。这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一、256号三叉戟飞机仅剩下12.5吨的油料，是飞到苏联实际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那么，林彪叛逃去苏联，就得最大限度地节省油料作直线飞行。然而，飞机却在空中绕起了大圈，浪费油料。这是为什么？二、如果说：256号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员是“正常死亡”。那么，机组人员在空中是否与林彪一家保持了一致？三、林彪一伙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是否曾经想去广州？是否有人曾经想回北京？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四、飞机的航向曾经从290度越过叛逃的航向325度到达340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古怪航向？这是要干什么？

◇ 自行降落之谜

有人怀疑，256号三叉戟飞机的坠毁是被导弹击中的结果，其根据是：飞机上有一个孔洞。但“9·13”事件发生后不几天，根据我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拍摄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降落爆炸的现场照片及他所掌握的现场情况，以及我所掌握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及飞行专业知识，我否定了这种说法。

我的根据是：一、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孔洞，直径约30厘米，且呈不规则形，这不是导弹的射径；二、孔洞在机翼下面，位于“中国民航”的“航”字旁。孔洞只在机翼下面有，而在机翼上面没有。如果是导弹击中，则上下两面都要有孔洞；三、导弹打下来的飞机，不会再滑行。而256号飞机在地面上滑行了29米。既然飞机不是导弹打下来的，那么，只能是飞机自行降落的。可问题来了：根据我们的测算，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落地爆炸前，油箱里至少还有2500公斤的存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飞了？为什么要在中途的蒙古国降落呢？这又是一个系列之谜：

一、难道是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闹翻了，他们自行降落的么？如果是这样，那么，林彪一家在降落前把手表、鞋子都脱掉了（这是准备迫降的行为），又怎么解释呢？二、难道是林彪一家要求飞机降落的么？飞机上还有存油，还能继续前飞，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叛逃了呢？三、带着这么多的存油就要在野地里自行降落，明知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进行呢？难道有人要同归于

尽么？四、飞机这种带油降落而爆炸的结局，是林彪的主意么？

许多有关“9·13”的谜还未解开。看来，林彪案件某些更深层面的东西，还有待于历史来揭示。

□ 原载：《人民网》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